

论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演进逻辑

□ 盛显容

摘要:政治统治框架下的文化治理,具有极强的国家本位色彩和阶级斗争意识,但过分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和工具价值,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文化治理,能够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但文化的经济效益容易侵蚀其社会效益和价值理性,导致深刻的价值观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开启了当代中国符合文化自身发展逻辑的文化治理,“文化治理中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国家精神和民族信仰。

关键词:文化治理;政治统治;市场导向;文化强国

作者简介:盛显容,武汉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湖北 武汉 430060)

DOI:10.19865/j.cnki.xxdj.2021.08.004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21)08-0016-03

自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以来,文化治理也逐渐进入学界的视线并呈现趋热之势。“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作为一个极具现代性意味的概念范畴,最早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从理论渊源上看,一般认为,其缘起于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经由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的“治理术”思想,明确于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本尼特的“文化的治理性”理论。他们都强调了现代国家理性在政治层面实现文化的隐性自洽而非显性权力强制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本身就内聚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审美与生活实践当中,成为一种实用的治理技术。“文化治理”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文化开始进入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治理领域,凸显出了政治权力运作范式的革命与创新。

但是,国内对“文化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经由台湾学者王志才等引入,20世纪90年代才有个别学者(何满子1994)论及文化治理问题。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之后,依托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文化治理才开始引起学界的深度关注。因此,截至目前,关于文化治理的概念内涵还未达成基本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一直没有进行过文化治理的实践。相反,笔者认为,我国文化治理的实践远远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介入国家治理的程度不同,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也不同。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文化治理”的理念和模式,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重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历史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一、政治统治框架下的文化治理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文化治理是从属于政治统治的框架之内的。这一时期,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仅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而且国家的文化发展政策也是高度统一。文化成为国家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发展方针,他强调:“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P865)}当然,这个“政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工农兵大众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因此,“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依然流行。于是,国家一方面大规模地加强基层文化政权的建立,在工农大众中开展“扫盲运动”,让千百万劳苦大众开始享有识字等文化权和受教育权;另一方面对一切旧的文化进行大力改造,包括对人的改造(知识分子)、对戏的改造(文艺戏曲)和对文化制度的改造(建立公有制的文化政权和文化生产机器)。这些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活动应该是当时中国文化治理的重要成就。国家通过这些文化治

理的活动,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在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权威地位,而且在工农兵大众层面重建了新国家新公民必须具有的新文化价值观。

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治理上的政治化色彩越来越浓厚,由大力地“防修反修”到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直接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文化政治化愈演愈烈,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所有的文化政策和治理方针都是围绕阶级斗争而展开的,都服务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文学、戏剧、电影等文化艺术都成为国家进行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的载体。国家的政治权力几乎涵盖和辐射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掌控着文化发展和治理领域的所有政策和资源。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与消费都由国家相关部门主导和统一规划,文化市场基本无从产生,文化组织也很难发育成长。或者说,国家文化部门既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供给者,也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管理者。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文化治理模式,导致了当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一性。

总的来说,这种政治统治框架下的文化治理,具有极强的国家本位色彩和阶级斗争意识。它希望通过整齐划一的宣传教化方式,将国家意志灌输到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中去,确实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同化作用,并在短时期内形成强大的动员力量。但是,这种“政治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治理模式,由于过分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和工具价值,忽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这种以自上而下直接的“国家指令”形式进行的文化治理,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文化发展市场的一般规律,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因此,它难以实现广大民众持久的文化热情,也难以维系广大民众对政治统治持续的文化认同。

二、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文化治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战略和路线,开启了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文化治理时期。“市场导向、文化管理,积极支持发展文化产业,大力推行文化体制改革”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的核心内容。

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领导方式也逐渐发生变

化。文化虽然不能脱离政治,但不再一味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而是把文化作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重要手段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邓小平明确指出,党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工作。同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P208)}。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的政治色彩虽然有所淡化,其经济属性却越来越被放大。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的口号也开始流行。国家开始把市场机制引入文化领域,文化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强烈。国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既“办文化”又“管文化”的全能模式,转向为市场经济导向下的“管文化”,而把“办文化”的权力逐步交给市场。文化市场化不仅使得中国的文化发展由“精英文化”走向了“大众文化”,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受到大众话语权的挑战,而且使得文化的娱乐性和消费性特征日益强化。只要国家管理得当、引导正确,人民群众通过文化市场的消费,不仅能够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认同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同时,对国家而言,文化市场化能够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释放文化巨大的经济潜力,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市场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文化体制进行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开始提出“文化产业”概念。这标志着我国文化管理的重心开始转向文化产业的发展上。随着文化产业的市场空间不断拓展,国家不仅于1998年专门成立了“文化产业司”的政府职能部门,而且还把“文化市场”“改革文化管理体制”等内容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接下来文化部分别制定了《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文政法[2001]44号),实际上是将文化发展的任务明确划分为了两大方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者各有定位和功能,相辅相成。但从文化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化产业的巨大经济效益更容易受到市场的追捧。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改革路线,实际上意味着文化产业政策上升到了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05]14号)出

台,释放出了文化领域全面改革的信号,并提出了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整体规划的重要环节。

市场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市场导向下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生产力被大大激活。但是,文化市场化、文化产品商品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社会效益和价值理性节节败退。市场片面追求文化的经济效益,大大侵蚀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空间和文化产业的民本逻辑。文化治理模式的转型和突围势在必行。

三、“文化强国”背景下的文化治理

当代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与问题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危机、价值观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但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却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那么,中国如何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也成为文化强国?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部问题,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还是需要用文化来解决。文化治理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必然趋势。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部署以来,中国文化治理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强。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发展目标。这应该是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文化理想和历史追求,拓展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空间和新使命。那么,如何才能不负使命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美好愿望变成现实?其路径何在?“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掷地有声。而这一重要命题和战略设计无疑不能缺少“推进和实现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就这样,文化治理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发展的新阶段,开始浓墨重彩地登上文化发展的时代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3](P105)}因而,在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上,“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领导权和话语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等构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自洽的“建设文化强国”文化政策体系,这些文化政策又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治理中国”的自觉和自信。

当然,现阶段文化治理中国的直接目的还是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P3)}这里的“美好生活”自然包括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三方主体协商共治的文化治理平台,激活多方主体协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这也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题中之义。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政治逻辑”下的文化治理到“经济逻辑”下的文化治理,直到现在才真正开启符合文化自身发展逻辑的文化治理。一路走来,文化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5]中国社会正处于并经历着“惊险一跃”的发展转型,出现了“资源资本化、权利资本化、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6]的矛盾交织和治理困境,迫切需要我们思考和创新国家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文化治理中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国家精神和民族信仰。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5]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 [6] 李云兰.当前经济改革的矛盾焦点及其结构性问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4).

责任编辑 朱婧婧